

献给中山医院 70 岁生日的厚礼——

我与中山

主编 臧兰玲



复旦大学出版社

献给中山医院70岁生日的厚礼——

我与中山

主编 臧兰玲

復旦大學出版社

编 委 会

主 任	王玉琦			
委 员	秦新裕	王小林	王国民	张志勇
	牛伟新	樊 嘉	高 鑫	汪 昕
顾 问	杨秉辉			
秘 书	臧兰龄			

目 录

风雨同舟 70 年	石美鑫 / 1
我与中山	冯友贤 / 6
此生永结中山缘	陈灏珠 / 8
严谨进取,走向世界	汤钊猷 / 13
在中山的岁月	李华德 / 18
我与中山医院的情缘	杨英珍 / 31
中山哺育我成长	廖履坦 / 34
高山仰止,清流涌波——我与中山的情缘	姜立本 / 41
悠悠五十载,浓浓中山情	张光健 / 47
中山传统与我	刘厚钰 / 52
半个世纪在中山	诸骏仁 / 55
与中山同行半世纪	蒋 豪 / 59
中山精神——我永远的奋斗目标	钮善福 / 62
中山医院,我的家	杨秉辉 / 66
承前启后,创中山新高度	吴肇汉 / 72
中山医院——我成长的摇篮	张元芳 / 76
中山——我的中国根	姜 楞 / 81
感谢中山,不忘师恩	张永康 / 86
在荣老的感召下前进	周康荣 / 88
传承前辈的精神,敢为天下先	王国民 / 91
难忘的中山岁月	祝堪珠 / 94





师恩难忘	石凤英 / 100
风雨兼程 30 年	徐筱萍 / 102
绿叶对根的情意	王小林 / 105
爱中山, 中山助我成长	姚礼庆 / 110
职业生涯, 一路上有你	臧兰龄 / 115
中山助我, 我助中山	秦万章 / 121
中山的“九三”人	王健瑚 / 125
我心中的中山	王玉琦 / 128
中山——我的骄傲	马曾辰 / 131
思慕中山, 风骨传承	秦新裕 / 136
中山长廊赞	蔡映云 / 141
感悟中山 30 年	王吉耀 / 144
中山——梦升起的地方	陈松鹤 / 147
毕生的事业——中山检验	潘柏申 / 152
我与中山	张 峰 / 157
思于责, 行于职	张群仁 / 161
勤奋工作, 开拓新路	徐智章 / 167
难忘中山情	王佩敏 / 170
我与中山齐奋进	王春生 / 173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我与中山 22 年	符伟国 / 179
感恩中山, 奉献中山	王 群 / 184
我的中山缘	高 鑫 / 189
青春铺就中山情	张 立 / 194
前进的路上不寂寞	薛张纲 / 197
难忘在中山成长的岁月	王建华 / 200
中山——自由呼吸的沃土	白春学 / 204
悠悠中山情, 拳拳赤子心	丁小强 / 209



我爱你,中山医院	牛伟新 / 213
中山助我开辟事业新天地	汪 昕 / 216
中山抚育我成长	钱菊英 / 222
中山精神——我为你自豪	施荣范 / 226
中山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	曾昭冲 / 233
中山在我心中	刘天舒 / 237
中山精神代代相传	吴志全 / 240
中山——我成长的摇篮	阎竹勤 / 244
受命于危难,展中山风采	邵云潮等 / 248
我与中山同行	张志勇 / 254
峥嵘岁月——中山扶持我成长	樊 嘉 / 258
中山精神有感	於亚辉 / 265
中山精神指引着我	石 虹 / 268
置身中山天地阔	程蕾蕾 / 271
中山伴我成长	金 波 / 277
感恩中山	舒先红 / 280
寸草之心报中山	葛均波 / 287
中山给了我新舞台	徐 梁 / 295
中山携我成长	吴代祥 / 299
真情奉献七十载,中山服务筑和谐	朱延军 刘 寒 / 304
中山,我愿把青春献给你	刘 寒 / 314
成长的快乐	朱延军 / 317
10年中山情	朱 玮 / 320
岁月如歌	蔡定芳 / 323
前进中的中山分部	杨汉平 / 327
“我和中山”青年辩论赛纪事	邵叶波 / 330
中山——事业的舞台	邹云增 / 336



中山——我人生的起点	陈嫣妍 / 340
我与中山 20 年:努力做得更好、更完美	赵 强 / 342
从黑白世界到彩色空间——在中山工作的 23 年 ...	王文平 / 347
关于蛇杖的联想	
——写在中山医院 70 周年院庆之际	杨国欢 / 350
读你——中山七十载	晓 阳 / 353
心随中山	刘少稳 / 355
傲立世界医学前沿——中山医院器官移植工作掠影	
.....	刘 嫣 金雪娟 杨 震等 / 361

风雨同舟 70 年

心研所 石美鑫

2007 年是中山医院建院 70 周年,70 年弹指一挥间。回顾往昔,思绪万千!

1936 年,我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新建的医学院为黄色琉璃瓦宫殿式 4 层楼建筑,东侧紧邻上医的主要教学医院——中山医院。它的建筑风格与医学院相似,但占地面积更大,楼层更高,更为雄伟。我们虽与中山近在咫尺,却都不敢随意进入医院。1937 年 4 月,国立上海医学院新校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同时还举行中华医学会第 4 届大会、中华麻风病学会第 3 届大会、中华医学史学会第 1 次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期间,我才第 1 次进入中山医院游览。1943 年,我从上医毕业并留校在重庆上医教学医院任外科助理住院医师。1946 年 11 月,中山医院复院,沈克非教授任院长,不久后,我从红十字会总医院调入中山医院外科工作。这样,在参观游览中山医院 9 年多之后,我终于成为中山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

从 1948~1956 年将近 10 年期间,我至少有 2 次可能离开中山医院。1946 年秋我班同学聂崇铭(后改名方春望,曾任山东医学院院长)等 3 人去解放区工作,约我同行。我欣然慨允,但要等到完成外科总住院医师培训,掌握较充实的临床工作能力后再前往解放区。为了实现这个承诺,1948 年我在完成总住院医师培训后,婉谢沈克非教授选送我赴美学习的安排,但因肺结核病复发住院,去





解放区行程只能暂时推迟。1949年春,我出院后,与当时地下党组织上海市卫生局药政处唐国裕同志商量,拟4月初联合中山医院外科、妇产科、眼科、内科、放射科医护人员7人取道青岛转赴山东解放区。行期确定后又接到指示,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江南,命留沪迎接解放。上海解放后,黄家驹教授向上医军管会申请我留上医工作。这样我就在新解放的上海中山医院继续从事医疗、教学工作。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抽调一批上海医学院教辅人员赴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按规定我应该调重庆。当时黄家驹教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考虑到上医胸心外科的具体情况,他向学校提出把我留在上海,从此,我在中山医院扎下了根。

上海解放前夕,我在女外科、儿外科病房各工作了一段时间,同时还参加了创立不久的胸外科工作。1950年冬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1951年夏天返沪后,沈克非和黄家驹教授确定我从事胸外科专业。最初,中山医院胸外科设床位20张,收治的病人主要是肺结核病,还有一些肺化脓性感染病例和食管癌、肺癌、纵隔肿瘤等。胸外科业务逐渐发展后,床位增加到50张左右。1952年4月参考苏联模式,中山医院更名为上海医学院外科学院,胸外科床位又增加了40多张,不但收治病例数明显增加,每年还接受全国各省市大量外科医师和护士来中山医院进行胸外科专业医务人员培训。在院长兼科主任黄家驹教授的领导下,胸外科还帮助江湾原国防医学院附属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开展胸外科工作。1955年8月,上海第一医院下属教学医院又将临床专科医院恢复为综合性医院。1956年8月恢复原名中山医院。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防治结核病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胸外科病例中肺结核病人日益减少,肿瘤病人逐渐增多。在治疗方法上用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病例逐渐超过施行胸廓改形术的病例。新的手术如全脓胸全肺切除术、胸骨后空肠代食管术等均于1953年获得成功。



同时,中山医院心血管外科也进展迅速。1953年中山医院成功地施行国内首例体外肺循环分流术治疗法洛三联症。1954年在缺少无创伤血管钳的困难情况下创造了先缝合动脉导管的两端再切断缝合动脉导管的新操作方法。其后半年中连续应用于7例病人均获得成功。1957年4月国内首例先天性食管闭锁及食管气管瘘婴儿在中山医院施行一期手术获得成功。1954年兰锡纯教授施行二尖瓣狭窄扩张分离术获得成功后,众多心脏病病人希望接受外科治疗,推动了我国心脏血管外科的发展。中山胸外科在麻醉科、心内科等科室的支持帮助下进行了大量低温下心脏直视手术的动物实验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1958年4月中山医院成功地为一位印尼华侨施行国内首例低温下心房间隔缺损直视缝合术。1958年底上海市在中山医院建立胸病研究所,当时即确定以心脏血管疾病的防治作为研究重点。进一步开展心外科临床工作必须掌握体外循环医疗技术,当时卫生部有意拨给一笔外汇购买人工心肺机。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有钱也无处买,唯一出路只有自力更生、自行研制。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市卫生局、中山医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有关临床科室和后勤部门紧密团结、多方虚心求助、认真探索,从材料、设计、性能检测、动物实验全面开展研究试制工作。在上海市众多工厂和单位的大力协助下,逐步取得进展。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制成国产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和有关体外循环的管道装备。中山医院和市立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医师进行了近200次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动物实验,并经上海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对动物实验研究评估认可后,从1959年9月21日起到当年12月8日在上海市6所医院应用自制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施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11例,9例获得良好疗效,其中1例为法洛三联症根治术。在1959年开展主动脉弓全弓切除移植术。1961年我们又进一步开展深低温体外循环的实验研究,并于1962年应用于左心室室壁瘤切除术和1964年应



用于二尖瓣瓣膜整复术。1972年起,研制人工生物瓣成功,并应用于临床。

时间过得很快,弹指之间我已在中山医院工作了60年。60年来,我在中山这个摇篮中,在领导和老师、同事们的关怀下,逐步成长、成熟,懂得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在沈克非和黄家驊两位老师的教导下,我先经受严格的外科医师培训,再进一步成为胸心外科专科医师。在我长期从事胸心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曾先后进行低温下心脏直视手术、人工心肺机研制、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深低温体外循环、人工心脏瓣膜等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等研究工作。在国内首例开展胸心手术10多项:如体-肺循环分流术、胸骨后空肠代食管术、全脓胸全肺切除术、先天性食管闭锁及气管食管瘘根治术、主动脉全弓切除移植术、动脉导管未闭缝合切断术、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异位右锁骨下动脉结扎切断术、右径二尖瓣狭窄扩张分离术、二尖瓣狭窄合并关闭不全直视矫治术、低温下心房间隔缺损缝合术、体外循环下主动脉瓣窦动脉瘤破裂缝补术、左心室室壁瘤切除术和硬脑膜生物瓣膜替换术等。主编《实用外科学》、《现代外科学》、《胸心外科手术图解》、《血管外科手术图谱》、《乡村医生手册》、《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上海生物医学工程杂志》等。参加编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外科学》、《沈克非外科学》、《黄家驊外科学》、《血管外科学》、《胸心外科手术学》等书。发表学术论著近百篇。并任《辞海》、《大辞海》、《胸部外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副主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胸心血管外科学会、中华医学教育学会、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胸心血管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上海市学位委员会顾问,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上海医科大学顾问等职务。

60年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山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不断奋勇



前进而取得的辉煌业绩。中山医院以优良的医疗作风、精湛的医疗技术、严格的科学管理、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为医院自身、为国内外医疗机构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学人才。不断提高医疗技术,使一些原来在国内不能治的疑难疾病变成能治、可治,而且可以治愈,为广大病人造福,体现了“一切为了病人”的崇高医德、医风。通过医疗服务和人才培养,中山医院在国内外得到较高的评价。60年来,我参加了中山医院创建胸心外科的艰苦历程,见证了上海市胸病研究所、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的筹建经过;从先立一块牌子到建成再扩建的一座座医疗科研大楼;从胸外科发展成为心外科和普胸外科两个临床科室;喜见中山医院心胸外科和心研所业务的飞跃发展;更为高兴的是看到新人辈出、朝气蓬勃,青胜于蓝。全院上下团结协作是我院各项业务得以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胸外科为例,创建初期,4位青年医师分别来自不同学校(上医、中正、岭南、同济),但相互之间关系和谐,每个人都置身于集体之中,出谋献策,尽心尽力,完成任务。有关科室之间也各尽所能、密切配合。面对奖励,首先想到兄弟科室和同事。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次加薪,陶寿淇教授和我都破格晋升三级。为此,我感到不安,顾虑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我逐级从中山总支到上医党委陈述意见,辞谢特殊待遇。

值此中山医院建院7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中山医院继续弘扬“一切为了病人”的中山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团结创新,不断前进,勇攀高峰!

我与中山

冯友贤*¹

我
与
中
山



Zhongshan Hospital 1937—2007

中山医院是培育我茁壮成长的摇篮。

那里有着3位我所难忘的老师：严师沈克非教授，恩师黄家驹教授和导师崔之义教授。他们的言行和举止深刻地烙印在我的成长发展过程中。他们工作勤奋，不断创新，为培养年轻有为医师，不遗余力。

我于1946年毕业于上医后，跟随黄家驹教授，是他选中我进入外科这个领域。次年（1947年）我被调派往刚重建的中山，转随沈克非教授。沈教授为人刚直，医德高尚，对工作要求极严格。当时抗战虽已胜利，但是百业萧条、民不聊生。部分医师离开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外挂牌开业，而沈教授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医师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为病人服务，不能为了开业赚钱而忽视为病人服务；同时他认为医生私下不宜接受病人的礼物，一切应按医院的规章制度办事。

恩师黄家驹教授于1946年期间返国后，即在上医附属医院内开展胸外科工作，后又领导全国心脏、血管外科工作。这充分展示他所树立的不断创新之典范。

在导师崔之义教授的直接指导下，我在中山开展了血管外科工作。

* 冯友贤 外科学教授，中山血管外科创始人之一。



为开展血管外科这门新学科,3位老师均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如沈克非教授经常提供我有关血管外科的原版书籍。黄家驷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我编著的第2版《血管外科学》撰写序言。崔之义教授大力支持在中山医院开展血管外科工作,并亲自与我赴上海纺织机构与有关专业人员讨论以蚕丝制造人造血管的问题。这些都是为开创、发展我国血管外科事业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至于我本人,仅在上述3位老师的启迪与指引下,踏着他们的足迹,为发展我国血管外科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此生永结中山缘

心研所 陈灏珠

六载寒窗学有成，悬壶沪上技益精。
回看岁月峥嵘处，报我中山哺育情！

我谨以此诗献给中山医院建院 70 年，也纪念我与中山医院共同度过的 60 年难忘岁月。

大学生涯：流亡漂泊，靠湾中山

我出生在香港，在那里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香港，全家逃难回到老家广东，在广东完成了中学学业。1943 年秋，在国难和家难中，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大学 6 年级时，受时任中山医院院长、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的邀请，由医学教育家王子玕教授推荐两位实习医师到中山实习，学校根据择优遴选的原则推荐了我和黄文华同学。1948 年 7 月，我平生第一次踏入了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中山医院的大门，看到了中山医院带有民族风格气宇轩昂的 6 层大楼，遇到了许多闻名遐迩的著名医学家，见到了中山济济的医学人才。尽管那时解放战争在激烈进行，时局仍在动荡之中，可我内心充满了对国家、对中山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像在大海里漂泊了多年的船最终找到了停靠的港湾，从此与中山医院结下不解之缘。





临床实习:播种辛苦,收获希望

初到中山,作为实习医生,任务是到各临床科室轮转受训,这期间我有幸得到了中山各科老师给予的正规而又严格的临床医学基本训练。按照医院规定,住在实习医师宿舍里,每天24小时负责为病人服务,连续观察每一位病人的病情。每周只有周日的下午休息半天。天天问病史、写病史、背病史和汇报病史,做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当时血、尿、粪常规检查等均由实习医师做),分析病情,提出初步诊断和治疗意见。观察病情的演变,写病程录,写会诊和做辅助检查的申请单等。学会和实施各种常规诊治操作,清晨为病人抽静脉血送化验,上级医师做手术时当好助手、术后伤口换药。看门诊、开处方,有时还协助上级医师处理急诊病人,及辅导5年级同学见习。此外还要收集资料写毕业论文。因为24小时负责制,休息的时间很少,晚上即使入睡了病人半夜里病情发生变化得起来去处理。所以这既是学习又是工作的一年实习医师生涯过得很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因为我没有辜负学校和中山医院各科老师对我的教导和期望,优异地完成了所有实习课程。实习阶段学到的基本功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终身受益。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的第2个月,我正式成为了中山医院的一员,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悬壶之处:精益求精,展鲲鹏志

作为新中国成长的第一批临床医师,我目睹了建国后中山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山医院的院训教导着我,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名言激励着我。在4年的住院医师期间,我坚持住在医院里,每天24小时负责为病人服务。并有幸能在林兆耆、钱德、吴绍青、陶寿淇、朱益栋、陈悦书、钟学礼和李李明教授等著名医学家的亲自指导下工作和学习,逐渐锻炼成具备



独立诊治疑难内科病人、进行内科教学和科研的一名内科临床医生。在“祖国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中山人”的感召下，1950年，我参加了上海市郊区解放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荣立三等功。1951年，我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救护伤病员工作，荣立一等功。抗美援朝医疗队回院后的第3年，我成为内科主治医师，选择了心血管病专业，继续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开展心血管病的医、教、研工作。1957年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的著名心胸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和陶寿淇教授选派我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著名心脏病学专家黄宛和方圻教授处进修心脏导管术。回院后我主持建立了中山医院心脏导管室开展心脏导管工作。1958年末，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在中山医院内成立，为我和所有中山的心脏科医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事业发展的空间。1962年，我编著的《心脏插管检查的临床应用》出版，同年陶寿淇教授和我举办了中山医院第一届心血管病诊断技术学习班，1955~1966年期间我发表这方面的论文近40篇，成为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奠基者之一。196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中山医院准备培养一批业务骨干，我被遴选上，院领导特请陶寿淇教授作为导师，陶教授和我共同制定了培养计划。可惜刚开始实施不久，1966年“文革”爆发了，所有计划成为泡影。

十年浩劫：陷入困境，共渡难关

“文革”期间中山遇到极大的困难。教学、科研工作陷于停顿。“医、护、工一条龙”、“不分高低年医师一律三班倒看急诊”、“上山下乡巡回医疗”。这期间我受命总管有100张病床的“跃进病房”，因病人多医生少，几乎天天晚上都被叫醒去抢救危重病人，工作的劳累可想而知。除了医院的临床任务外，处于困境中的中山和中山人依然认真履行救死扶伤的社会职责。1968年我参加医疗队到贵州省威宁县巡回医疗1年；1969年又参加医疗队到云南省通海